



复旦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新编第891期 2011年10月12日
国内统一刊号 CN31-0801/G

回顾辛亥百年 抒发爱国情怀 复旦师生收看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

本报讯 10月9日上午十时,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全面回顾了辛亥革命 100 年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国

家完全统一的殷切希望。复旦师生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观看了纪念大会,并一起讨论和学习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抒发爱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史系姜义华教授认为,辛亥革命中最突出的是中国人挽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下转第2版)

我校向社会公布 2010 年人才培养工作报告

坚持学生为本 打造复旦特色

本报讯 9月29日,根据教育部要求,我校在学校主页上向全社会公布了《关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工作的报告》。《报告》对我校的本科教育教学思路作了整体阐述,清晰勾勒了人才培养工作的轮廓和重点,并为本科教育改革描绘了愿景。

报告首先指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复旦大学自国家教育纲要出台以来一直坚持实施的核心方向,也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过去一年里,我校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培养的机制体制,探索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通识教育新模式;逐步调整本科生培养的规模与结构,加大经费投入,加强政策引导,全面调动“教和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营造重视本科教学的风气,引导教师集中精力于本科教育教学,真正把本科教育作为复旦大学的办学核心,培养兼具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

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

2010 年,我校修订了本科培养方案,力求体现文理基础教育为特色的复旦通识教育。重视培养和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实施通识教育课程和文理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对原有专业知识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教学培养方案的规范性、延续性和开放性,打造复旦特色的通识教育。

此外,我校对通识教育的实施办法和实施载体做了进一步完善,控制本科招生规模,优化选拔方式;筹建本科生院,改进本科培养体制机制;启动新一轮

课程建设,培育优质教学资源。

在培养方式上,我校以创新拔尖为人才质量目标,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2010 年,学校继续推进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目前,在学校层面实施的有“茗政项目”、“望道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在院系层面组织实施的有“曦源项目”。这些资源整合成“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项目”平台。对于医学人才培养,过去一年来,学校通过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办学理念,推出了适合自身条件、体现自身特色的全新课程模式和

管理架构,构建以器官 / 系统为基础的、模块化的整合式医学课程体系。

在探索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学校拓展校际交流与合作,加大国际化办学力度。

大学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的使命,但最首要的使命和最根本的任务是人才培养。复旦大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核心方向,在重视学科建设、提升国际性、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本科教学基础工作。



9月30日,我校附属肿瘤医院特聘教授劳伦佐·考恩(美国)获2011年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上海市市长韩正向12位获奖的外籍人士颁授证章、证书。摄影报道 / 刘畅

复旦科学家领军团队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抑郁症患者大脑中缺失“憎恨”网络

本报讯 我校计算系统生物学中心主任冯建峰教授领衔的团队与湘雅医学院、英国华威大学以及剑桥巴布拉克姆研究所科学家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大脑中“憎恨”网络缺失,正是这种缺失可能导致抑郁症病人难以控制对自己或他人的负面情绪。该论文10月4日已在线发表在全球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的子刊《分子精神病学》上。

冯建峰介绍,人体大脑中的“憎恨”网络由额上回、杏仁核、

壳核等区域组成。当人们看到自己厌恶或者有强烈感情的人或事物时,这些脑区即会被激活。该团队在研究中建立了健康人脑的功能连接模板,并将其与抑郁症患者的脑功能网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其中最显著的区别体现在抑郁症患者的“憎恨”脑网络已消失。正因为“憎恨”功能异常,故抑郁症患者的重要表现是“恨自己”。此研究也表明,“爱憎分明”的人群患抑郁症的概率可能会低于不易产生“憎恨”情绪的人群。但究竟是

“不会恨”导致抑郁症,还是抑郁症引发“憎恨”脑网络的消失,冯建峰表示尚不明确。

该项研究将为抑郁症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为进一步揭示其它脑疾病中脑功能连接网络的异常奠定一定的基础。该研究团队还发现其他一系列脑功能网络的变化,如危机反应、情感、注意力、记忆力等。冯建峰表示,此项研究工作的社会意义在于:个人恰当、适度地宣泄其负面“憎恨”的情绪,有助于其心理以及精神的调节。

要闻简报

校党委书记朱之文 赴江湾张江校区调研

本报讯 9月24日,校党委书记朱之文一行分别赴江湾和张江两校区调研,了解两校区管理现状及各院系发展情况,与校区各入驻院系、部处负责人交流。

在走访过程中,朱之文对各学院近年来的成绩表示肯定,并鼓励大家抓住机遇,珍惜现有的良好条件,加强资源利用,促进学科发展,为师生教学科研创造良好环境。

农工党复旦大学 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 9月2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复旦大学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中山医院中山大讲堂隆重举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第十届政协副主席、上届农工党市委主委左焕琛、农工党复旦大学主委黄峰平等出席大会。

我校民革等兄弟党派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基层单位党组织领导到会祝贺,复旦大学农工党党员代表97人参加了此次代表大会。文 / 包一敏

国际神经退行性疾病 学术会议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由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美国 Molecular Neurodegeneration 杂志共同主办的国际神经退行性疾病分子机制学术会议9月22至24日在上海医学院举行,国内外450多位代表与会。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神经退行性疾病与转化医学”圆桌讨论会。文 / 孙国根

王枫校友获美国青年 科学家总统奖

本报讯 2010年度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名单揭晓,94名杰出青年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荣获殊荣,其中华裔6位,包括我校99届物理系校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和材料科学系助理教授王枫。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10月中旬为获奖者颁奖。

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由前总统克林顿1996年设立,是美国政府对青年研究人员的最高奖项。文 / 章焕春

中国高端医学 期刊走向世界

本报讯 由复旦大学教育部 / 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闻玉梅院士和德国马尔堡病毒研究所 Hans-Dieter Klenk 教授共同担任主编的英文期刊《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新发现病原体与感染》)9月26日在上海医学院与自然出版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具有 ISSN 国际出版刊号,期刊将致力于为全球范围内的微生物学家、临床医生等提供信息交流论坛;关注在发展中国家新出现的传染病,探寻新发现的致病微生物与已发现病原体未知的表型与基因型特征和发病机制,以及流行病学趋势。

据悉,自然出版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出版集团之一,1869年创办的第一本期刊《自然》(Nature),是全球科技领域最知名的期刊之一。

签约后,自然出版集团还将为《Emerging Microbes and Infections》提供英文修订、国际市场推广和引用分析等技术支持和服务。文 / 孙国根 黄茵

专访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俞吾金：

教书育人廿七载 桃李神州誉自来

日前，国家教育部公布了第六届(2011年)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名单，我校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获得“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此外，我校卢大儒、金路、浦兴祖、叶德泳、程训佳等5位教授获得了第六届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安心教学，潜心育人

俞吾金教授1984年毕业于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其后留校任教，至今已有27个年头。在其教学生涯里除在外交流的几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开设了本科生教育课程。日前，俞教授每年为本科生开设两门课程，每学期第一个学期开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学期开设《哲学导论》。

早在前两年，俞吾金教授已获得第五届上海市教学名师奖。对于这次获得全国教育名师奖，俞教授并没有感到特别。正如其博客签名，他认为“做一点事情，但不要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太重要。”这是俞教授一直对自己的要求。言传身教，他教育学生“不要将成绩看得太重要，而是要通过对哲学的学习，用哲学的眼光思考人生。”他坚持亲自批阅《哲学

导论》课上200多位学生，《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课上80多名学生的试卷，对每位学生的成绩负责。每年的讲义，他都会根据自己理解的变化和国际学术界前沿研究进行更新。对于本次获奖，他的体会是“重视本科教学是获得该次奖项最重要的原因”。

“金粉”满天下

善于和学生交流，是俞老师的第二个心得。

“我每天都查收邮箱，回答每一位同学的问题”。他善于捕捉时代的潮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法，和学生们零距离的交流，拉近师生间的距离。除了用邮箱和电话与学生联系，今年5月，他适应网络时尚的潮流，开通微博。仅仅4个月时间，“金粉”数量已经达到4617位。

正如俞老师向学生提倡的“no stupid question”和“please make a mistake”的精神，“金粉”们在微博上经常与俞老师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更有不少是对俞吾金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大有挑战“权威”的意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哲学的思考不尽相同，通过微博

的方式来交流大家的想法，让思维的火花碰撞，俞老师的目的达到了。

站两个小时也要听俞老师的课

俞老师的课堂热闹非凡。这学期开设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精读》一门课选课人数只有80人，可是200人的大课堂里面，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学生。在场软件工程专业的一位同学反映，“我一下课，就赶过来上俞老师的课了，提前十五分钟还是没有占到位置，有些同学一早就来把位置占完了，没办法，站着也要听俞老师的课。”

南京师大的访问学者告诉记者，“在俞老师的课上，俞老师能用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康德思想啊，将人物以鲜活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他的课上，我可以领略到他的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教学人员，我可以学习到俞老师传授思想的方法。”

研二的石同学告诉记者，“我看到了校报上做了俞老师在13号开办的‘哲学何为’的讲座报道，被俞老师的学术魅力所吸引，这次专门赶来上俞老师的课。”

文 / 龚翠霞

区校科研项目合作对接会
复旦信息产业专场举行

本报讯 9月28日，杨浦区“创新资源与金融资本项目对接会复旦大学信息产业专场”在我校举行。此次活动由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和上海市杨浦区科委联合举办。

会上，来自复旦大学信息领域的8位教授级专家分别对数据产业、软件协同、通信数据调制与编码、媒体计算等方面的技术及应用做了介绍，并就团队的研究成果与现场企业进行了互

动交流。在场的多家企业对这些科研成果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提出共同研发合作的意愿。

此次对接会是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杨浦区科委共同推出校地科研合作的新尝试，以聚焦新兴产业方向、聚焦区域经济发展重点，学校寻找具体学科方向对接产业集群，以专业小型化、政产学研资一体开展项目与资本的对接工作。

文 / 李利梅

第五期市干部选学培训结束

本报讯 9月24日，第五期上海市干部选学培训“公共管理能力与领导者素养”课程在我校圆满结束。

校党委副书记王小林出席了本期课程的开班仪式并致欢迎词。本次培训课程围绕“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西文化比较、中国的周边外交、行政法律风险及其规避策略、文化积累与领导境界、比较政治研究与中国国家建设、中国政治智慧及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等8个主题，

以讲座的形式开展课题研讨。课后的意见反馈问卷调查显示，学员们对本次选学培训的专题设置和课程内容都十分满意。

上海市干部选学培训由上海市委组织部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旨在增长中高级干部政治知识、培育政治才干、开启政治智慧、提升政治涵养的教育培训课程。本期上海市干部选学培训课程共吸引了来自全市各政府部门厅局级干部140余名学员。

■ 新闻故事

复旦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

报告称人民币有效汇率将加速上涨

本报讯 10月22日，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主持研发的复旦人民币汇率指数正式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元走强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可能性较大，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在四季度料将继续上升，并有可能超越金融危机期间，创造汇改以后的新高。

报告指出，有三大宏观因素影响三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势。首当其冲的是政治因素，它正成为影响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并有可能主导今后世界经济走势。其次是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冲击。欧盟和IMF采取的救助措施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政治分歧成为欧债危机有效解决的主要障碍。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蔓延到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国家，这使得援助的困难加大。最后是国内价格水平。2011年以来我国CPI一直保持高位，国家一直实行货币紧缩政策，高通胀催生加息预期，引发资本流入，对人民币形成升值压力。另外，汇率已经成为央行抗通胀的工具之一，在节节攀升的通胀率之下，央行将通过人民币升值的

方式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

报告指出，美元近期迎来强势，因为美国经济毫无起色，高风险资产遭到抛售，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避险需求导致美元回流，推高了美元价格。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会依然保持升值态势。首先国家要通过升值来抑制国内的CPI。其次国家表明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坚决态度，这可能与为防止资本外流和国外看空人民币有关。而且随着美国大选来临，施压人民币汇率将是美国政党为自己拉票的不二选择。

目前发达经济体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外部需求下降，此时人民币有效汇率若大幅升值，可能会导致进出口大幅下滑，从而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覆辙。

所以报告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弹性，切实改变单边升值态势，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以规避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

我校举行离退休
老干部代表座谈会

本报讯 9月28日下午，老干部工作处举行邯郸和枫林校区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座谈会。

会上，老干部们结合日前校党委通报学校工作的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杨玉良校长、王小林副书记参加研讨。 文 / 叶依群

我校理工医科获13项
市教委科研创新资助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教委发布2012年度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资助名单，我校理工医科13项重点项目(自然科学类)获资助。

上海市教委为培育国家级项目，支持中青年教师，从2007年开始实施“科研创新项目”，分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每类设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文 / 徐晓创

NEWS 播报

●9月26日，香港城市大学讲席教授、IEEE会士陈关荣教授的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授证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举行。-----

9月22日，我校被市档案局评为2006-2010年上海市档案法制宣传教育优秀单位。郭蓓

■ 图片新闻



9月29日，后勤党委在复旦燕园宾馆举行2011敬老节集体祝寿活动。副校长许征应邀出席。

(上接第1版)这是辛亥革命最深的民族精神根基。“大会对辛亥革命给予了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参与者、领导者的历史功绩。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现在更多地看到革命者在民族复兴历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同时也意识到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系青年教师马建标说，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民生革命。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伟大革命的思想家。一百年前孙中山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在今天也是有

其现实意义。

学生们在观看大会后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极大唤醒了民众觉悟，有力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学生们也纷纷表达了对孙中山等革命先贤的深切缅怀之情，并表示要将这种宝贵精神发扬光大。管理学院10级的钱心臻表示，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应当牢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将来积极投身祖国建设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章培恒先生 在古委会的二十八年

安平秋

今天是章培恒先生去世后的第 32 天。在那之前，他还活着，我们在座的人还和他通过信，通过电话，甚至和他见过面，而今天，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章培恒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版发布会”。对这样一个题目，我没有资格发言，也没有能力说清楚。我只是觉得，除去章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和他的《新著》中写的序言、导论中明确讲到的写作指导思想外，我们探讨他的学术思想，应该和他的人生阅历、学术经历联系起来。章先生在旧中国、新中国都生活过，经历过大到社会变革，小到个人人生的变故；他所从事的工作，既涉及中国古代的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也涉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他本人又有在国外教学的经历。以章先生的绝顶聪明和精细、独到的作风，他是吸取了他所涉猎到的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精华。所以，他的学术思想，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但就总体来说，是蕴藉百家而独树一帜的。这使我想到《汉书》中记述的汉宣帝的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在会议主题之下，我的一点浮浅认识。

章先生人生的最后 28 年和高校古委会有着极深的关系和感情。古委会是 1983 年建立的，章先生任委员；1986 年换届时，他增列为第二届古委会副主任；其后第三届、第四届直至他去世，章先生一直是古委会副主任。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古委会的兴盛时期，人们评价古委会的工作成绩是凭借了主任周林同志的号召力，秘书处的凝聚力和副主任、各委员、所长的支撑力。这支撑力之中，章培恒先生是最有力的。我举一个例子：1984 年下半年，北大、川大两个古籍所几乎同时提出要上马《全宋诗》，而且各不相让。后来他们又提出划江而治，一家搞北宋，一家搞南宋。但很快又都推翻了自己的意见。我当时是分管科研项目的副秘书长，但我又是北大的人，不便下决断，感到为难。这时章先生向我建议不如一家搞《全宋文》，一家搞《全宋诗》。我们委托当时的秘书长马樟根先生去川大协调。川大的同志说缪钺先生、杨明照先生、胡昭曦先生、刘琳先生同曾枣庄先生一起议论，也想到这个办法，并且认为川大承担《全宋文》更合适。于是才有了今天已经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诗》两部传世之作。

1985 年，章先生和董治安先生共同担任古委会科研项目评审组的召集人，直至今年。这 26 年间，从大项目的策划，到各类项目的评审，都是在章先生的主持下，他公正刚直而又思虑周详，既考虑到项目的学术价值，又考虑到承担人的学术能力，不营私利，肯为申报人着想。

从 1986 年到 1992 年的 7 年间，古委会组织了一套普及中国古代文化的丛书——《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共 135 部。由章培恒先生、马樟根先生和我担任主编，以古委会联系的 18 个研究所为主要力量。1990 年 12 月，在第一批 50 部书出版之后，为保证第二批 50 部书的质量，在广州开完编委会后，我们三个主编赶到北大，用 7 天时间审看 18 部书稿，最后商定通过 7 部时，已是 199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中午章先生在古委会秘书处和大家一起包饺子、联欢，下午赶回上海家中过年。所以，在章先生去世后，马樟根先生从美国给我发来邮件说：“我们三人，当年于公于私情同手足。”他说得对，这手足之情，是在对古籍整理事业、对众多学者的无私奉献中建立起来的。

章先生在古委会的 28 年间，也有委屈，有忍辱负重的时候。其中最突出的是古委会在上海办了个绍文公司，让章培恒先生任总经理。那是因为在 1992 年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属于第三产业，“要逐

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当时古委会主任周林同志估计国家会逐步停拨古委会的经费，要发展高校古籍整理事业只有自己努力，于是决定在上海办公司，选中他所器重的章培恒先生负责。加上当时有人推荐章先生，说他是全才，他的头脑比电脑还灵，周老认定非章先生莫属。章先生在矛盾之中接受了任务。但是同年 8 月初古委会在青岛开会期间，他找我谈了一次话，表示不能担任这一工作，特别是提到精力用到办公上，怕不能完成《全明诗》的工作。是我劝他现在退已经难了，他才硬着头皮接下来。其后，他为此累得寝食难安，外界又议论纷纷，说他不做学问办公，又赶时髦想发财，而上面在 1994 年又发文件说事业单位办第三产业不对，理解错了。在多重压力之下，他身心憔悴，有苦难言，直到 1999 年才有一个初步的解脱，至今也没有全部了断。我想，这也是他后来身患重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 1996 年底接任古委会主任的工作，章培恒先生是全力支持我工作的一位。当时，周林同志任

怀念章培恒先生

裘锡圭

章先生比我大一岁，五十年代初我们先后进入复旦大学念书，不过章先生在中文系，我在历史系，我又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差的学生，所以在学校里面没有认识章先生。1956 年我毕业以后，随导师胡厚宣先生去了北京，就留在北京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机会和章先生相识。文化大革命后，到 1981 年，由于中共中央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2 年 3 月，小组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在这个会上我才和章先生认识。当时在这个小组里，章先生和我是年纪最小的两个。我们见面以后谈了不少话，发现大家对于事情的看法很一致，真是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年，也就是 1983 年，当时的高教部又成立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委会），章先生和我都是委员。古委会活动比较多，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

我这个人知识面很窄，在自己搞的那些东西之外，知道的东西是不多的，在古籍方面知识尤其不全面，所以我在古委会里事实上是滥竽充数。章先生不但对文学史的研究非常精深，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也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由于他的经历，他对古籍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在古委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些安平秋先生刚才已经讲过，就不用我细说了。古委会的人对章先生的意见都非常尊重，我更是经常要请教章先生。

我对文学史是外行，但是我搞的汉简里有一些文学史的资料，所以我也写了两三篇关于汉简里的文学资料的文章。章先生对我这些工作也非常关心。我写的一篇《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就是章先生推荐给《复旦学报》（社科版），在 1999 年第 3 期发表的。我本来还要写一篇全面论述汉简里俗文学资料的文章，本想写好以后首先送给章先生，请他批评指正，然后再修改发表。但是由于手头必须要处理的事情太多，这个计划一直拖延了下来。以后这篇文章就是写出来了，也没有办法再请章先生指教，只能作为对章先生的纪念了。

来到上海以后，跟章先生见面的机会当然更多了。章先生病重之后，我因为担心给章先生增加感染机会，没有再敢去看章先生，由于怕章先生劳累，电话打得也不多。今年春节前，听《复旦学报》的陈文彬先生说，章先生回家了，而且精神还可以，我就在除夕前一天打了一个电话给章先生拜

年。章先生说，去年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抱着可能恢复的希望，今年是没有这种希望了。听了以后，我当然感到很难过。本来怕章先生累，不想把电话拖得很长，但是我听得出来，章先生还是愿意在电话里跟我谈谈，就谈了一些学术界的情况。章先生也不时插话、提问题。谈了大概总有一二十分钟吧，也许更多一点，我感到不能再谈下去了，章先生太累，就说：“真对不起，讲了那么多不相干的事。”章先生说：“不，我很愿意谈谈这些事。”言下之意就是他不愿意一天到晚地想他的病。通过这个电话，我一方面感到章先生对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的；另外一方面又感到，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章先生对于生活，对于他一辈子从事的学术研究、教学工作的热情一点没有减退。

章先生对于学术研究，对于他承担的教学工作，即使是病重以后也照样关心，包括对于《复旦学报》上他和陈思和先生一起主持的专栏的工作。章先生病重以后，大家都知道，他还是一直在关心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修改以及研究生培养等工作。我知道章先生本来是没有心脏病的，至少没有发现有心脏病，就是在 2009 年，他为修改文学史而写东西，耽误了午饭跟午休的时间，结果就犯了心脏病。他自己还不知道，到医院一查，医生说你不能回家，心脏的情况非常危险。这一次在医院里住了不少日子。

章先生一直坚持各方面的工作，对于古委会的工作也是这样。他一直主持项目评审的工作，我记得 2008、2009 这两届项目评审会因章先生身体不好，是到上海来开的。2008 年章先生的身体已经很弱，但是他还是住进了开会的酒店，坚持跟大家一起全程参加了这个会。有一个晚上，我们开会的人到外面吃饭，他感到精力不够，就在房间里吃酒店送上去的简单饭菜。2009 年，他已无力跟大家一起开会，但仍然看了有关材料，认真填写了项目评审投票表，交给会议。去年，这个评审会是在北京开的，当时章先生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是他仍然根据寄给他的材料，填写了投票表，寄回北京。所以在各方面他都是这样，虽然生了病，还是照样尽他的力量去做。

我很希望章先生能够闯过 80 岁的大关，为复旦、为古委会、为学术界再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愿望没有实现，章先生还是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一定要以章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中那种坚忍不拔、站完最后一班岗的精神和态度来激励我自己，争取在我的秉烛余年，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整理 / 段天姝

（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编者按：

章培恒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个月了，我们对章先生的怀念一直未曾淡去。本报特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和我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先生在章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资纪念。

主任时期的老副主任只有章培恒先生、裘锡圭先生两位留任，又新增了许嘉璐先生、周勋初先生做副主任。他们 4 位都比我年长，是我的长辈，论德、论才、论学识，他们都远在我之上。但是他们都真诚地支持我、帮助我。尤其是章先生，他对古委会的事、对有关古委会主任的事情，处处维护。我从教育部同志那里，从裘锡圭先生那里，从其他朋友那里，听到过章培恒先生背后对我的信任和推重。起初我认为这就是朋友之间的信任与支持，最多就像一位师长对自己学生的信任与看重，后来渐渐发现他是有如兄长对待自己喜爱的弟弟那样，看到我的进步和成绩就由衷地高兴，听到别人的议论就赶快提醒我。记得 1996 年一年之内他四次邀我到复旦，几乎天天陪着我，总有说不完的话，只有半天他到学校接受首席教授还是杰出教授的荣誉没有在一起。2000 年 5 月，在他确诊为癌症以后，我到复旦，他又和我作了两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近几个月，他知道我身体不好，多次打电话让我到上海治病，他看我不太重视自己的身体问题，就急切地说：

“你现在的症状就像是癌症，我就是自己耽误了！”他去世之后，谈蓓芳老师对我的同事曹亦冰老师说：“章先生有一封给安老师的遗言没有写出来，是不放心安老师的身体。”谢谢章先生临终前的殷殷关切，此生我是再也无法回报了！这些天静下来想到这件事，深深感到这些年我对他的关心远远不如他对我的关心，真是对不起他。

今天在复旦大学开会，因为章先生是复旦大学的人，更因为章先生深深地爱着复旦大学，这是他为之心血和生命的学校。近三十年的交往，他很少直接和我谈复旦和复旦中文系，但我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心，在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中文学科。今天我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章培恒先生的形象和精神留在复旦的校园内，哪怕是留在中文系、古籍所，让他的身心能在他眷恋的土地上安息，也使后来的青年学子知道在复旦大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正直、真诚、德才学识俱佳的章培恒教授，那将是一种使人们向上，使民族向上，使国家向上的感召力。

砺志讲坛纪念辛亥革命专场

辛亥革命之于中国：是革命，也是转机

本报讯 9月29日,砺志讲坛第十九期——辛亥百年专场如期举行。历史系姜义华教授、朱荫贵教授和马建标老师分别从中华民族、近代经济和学生的国家观等角度为现场同学解读辛亥革命后中国发生的变化。

姜义华首先谈到,辛亥革命是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真正进入现代性国家。“我们曾经学习其他国家的模式,孙中山曾试图建合众国,还有人希望建立联邦制,但是当真正组建国家政权后就会发现,中国一直是单一的整体,若强要分开就是违背现实。”姜义华提出,辛亥革命后三权分立也曾在中国实现过,但何谓真正的民主?中国一直在探索。他认为,辛亥革

命的功绩在于引导我们对问题进行反思,中国还需要努力思考和实践,坚持本国的主体性。

朱荫贵主要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和近代企业。他提出,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主要发展军工企业,政府对民间企业基本没有什么鼓励的政策。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变迁。北洋政府着手建立起一套工商财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在两年之内制定二十多项。有了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再加上一战给我国的经济带来的相对轻松的环境,中国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白银时期。虽然这段时期开始出现了市场经济的格局,但因为这时的中国还受到各种束缚,外资的力量也很强大,只能说辛亥革

命是近代经济史的一个节点。

从事民国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的马建标向在场同学讲述了辛亥革命后大学生的国家观念的变化。1915年的5月7号中国被要求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此时学生持有的观念更偏向于民族国家观。后来,由于政府试图同日本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条约,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这便是五四的前奏。1919年,日本试图接任对山东的管辖权的举动直接激发了国民的民族危机意识,于是五四运动爆发了,辛亥革命对于催生学生运动功不可没。

在提问环节,一位同学提出,在特殊年代,学生究竟应该参与政治还是一心学习?马建标谈到,其实这一问题并无定论。蔡元培

先生曾试图将学生参政与专心学业二者折中,但是最后由于种种阻挠未能成功,而胡适的看法是学生应该回到课堂一心求学,“两耳不闻窗外事”,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激进派人士则认为诚然学生要读书,但更要关心国家大事。

另一位同学问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与东方、传统与近代的划分。“不能简单拿一种模型套用于另一国家”,姜义华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走自己的路。中国曾学习苏联模式,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还是得走自己的路。

讲座最后,学生代表为三位老师送上了嘉宾漫画像表达敬意。在主持人“振兴中华 努力前程”的结束语中,此次专场讲座落下帷幕。

文/周丹

我校 2011 秋季心理健康文化月开幕

本报讯 9月25日,秋季心理健康文化月拉开序幕。

此项活动目的在于推动广大同学树立自我关爱的意识和普及维护心理健康的知识。今年除了讲座之外,还将采取演讲比赛、影视赏析、笑吧等多种形式。

在开幕式上,澳大利亚喜乐团还为师生们带来他们今年在中国公益巡演的首场演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希望通过文化月活动,鼓励同学们积极生活、健康成长。

文/朱臻雯

宁夏校友会看望西吉研究生支教团

本报讯 9月26日,我校宁夏校友会偕同宁夏教育电视台,看望了正在西吉县开展支教工作的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校友会的老师们向支教队员赠送了羽绒服,以及方便面、挂面、肉罐头等生活用品,仔细询问了支教队员的生活和教学情况,并鼓励支教队员们积极奉献、服务宁夏。研究生支教团于1999年成立,连续13年向宁夏西吉、贵州息烽的乡村中学提供志愿支教服务。

文/陈之衡

总务处与腾飞书院学生面对面交流

本报讯 9月20日,总务处处办支部邀请复旦学院腾飞书院九个班级的生活委员一起参加组织生活会。

腾飞书院的班级生活委员在会前搜集了大一新生在学习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困难和建议,涉及到校园环境、食堂餐饮、场馆管理、园区设施等多个方面,在会上与总务处老师进行了交流和沟通。总务处副处长郭建忠表示,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主人翁的意识积极投入到和谐学校的建设中。

文/朱莹

中山医院开展“九月钟林”学术文化节

本报讯 9月13日至27日,为期一个月的中山医院“九月钟林”学术文化节落幕。

“九月钟林”学术文化节自1999年举办至今已有十三个年头。开幕式上,葛均波教授受邀作了题为“怎样的医生才是一名好医生”的演讲。约150名医学生及青年医生到场。文化节期间,举办了交流沙龙、体育嘉年华、医学生活主题摄影比赛等。闭幕式上,举行了新一届“中山急诊志愿者”队旗交接仪式。

文/陈惠芬

经济学院建立学生服务中心

本报讯 经济学院在本学年年初,筹建了学生服务中心,解决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服务中心采取全开放式的玻璃房设计,只要学生一走出电梯,就能够看见玻璃房中忙碌的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首问责任制”也使得每个问题都能得到最快时间的回答。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提出,“所有工作都以学生健康成长为重点,一切工作都以学生培养为核心”,这个学生公共资源配置便应运而生了。

一方面,中心把学生和老师、学院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为各方及时沟通搭建了一个桥梁,改变了学生遇到问题不知何处办理、如何办理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心及时向学校反馈学生的问题,也能让学院随时了解学生的动态,可以给予学生更多的了解和关心。

文/郑璐

NEWS 播报

9月27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了第十一届师生田径运动会,共410余人参加。马波

9月21至26日,物理系为2012届毕业生开展求职指导工作,强化求职技能、提升求职心理素质。高太梅

9月28日,中文系教授傅杰为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1级研究生新生作了题为《论语对中国人的影响》的讲座。吴越

我校网络学院在9月末,为患上了急性淋巴型白血病的校友蒋晓鸣举行募捐,得到广大师生的响应,共募集善款1.75万元。侯申龙 祝智毅



金秋校园 丹桂飘香

① 四教附近的校园小路,桂花飘香催人留。文/摄 李博

② 急转直下的气温让今年的桂花开得有些突然,却也尤为繁盛芬芳。也因为气候原因,待国庆假期结束时,这片金黄已大抵落幕。文/摄 崔璨

暑期实践故事

把营养常识普及到大山深处

7月14日,盛夏的阳光透过山林依旧燥热灼眼,来自公共卫生学院的7名10级研究生,来不及向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石梯子村的乡亲们一一告别,带着耗时五天、翻山越岭得来的第一手关于村民营养知识的调研材料,踏上返沪的火车。

刚结束“呵护芳草绿、关爱夕阳红”暑期社会实践的7名研究生丝毫不敢懈怠,迅速投入了后期数据分析工作。“不走进中国最基层的地方,不实地接触最底层的群众,就不知道中国营养卫生事业的现状,不确定我们课题应该瞄准的方向。”参与调研的组员甄玲燕说。

时间回到7月8日,调研组7人一路颠簸,背着装满宣传海报、调查问卷和纪念品的大包小包来到长城脚下的石梯子村。“我们每天6点起床,步行1小时到村组入户调研。晚上结伴才

敢走过漫长山路回到住处,还要加班到12点整理材料。这次调研得到的309张问卷调查和10户深度访谈资料,都凝聚着大家的心血!”组员钱小兰说。

尽管大家对农村的营养常识的欠缺有所心理准备,但石梯子村的实际更让同学们感到吃惊。乳制品和含乳饮料的区别、补钙和补铁的途径、维生素C的来源等常识性问题,村民都很难准确回答。“农村嘛,哪有那么讲究!”这是调研组入户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看到村民亟待纠正的一个个营养学误区,调研组利用入户的机会就现场提出各种建议,还专门在村委会举办了“老年人饮食营养及婴幼儿喂养知识”的讲座。得知消息的村民,不顾山路遥远,专程赶来聆听,围住这些复旦的研究生问这问那。同学们从带来的宣传小册子也成了抢

手货,被大家小心地收藏起来。

“一次活动可能不能改变太多,但我们能做一点是一点。”甄玲燕介绍。短短五天,在这个闭塞的村庄,人们坚守多年的观念,也因为复旦研究生的到来悄悄变化。

一位照顾留守孙子的老大妈说,过去以为火腿肠是肉做的,就经常给孩子买。现在从研究生那里知道,这不但没什么营养,吃多了还影响吃正餐。

一位老大爷说,研究生告诉他们,像房前屋后的核桃、山楂,这些再普通不过的果子,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还能预防很多老年病。“今后我准备多吃点。”

谈及在河北山村的调研经历,钱小兰说:“看到村民有所收获,我们觉得再苦再累很值得。要让科学的营养常识在百姓头脑中扎根,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文/万虎 毛奕云

中美合作成立“复旦肿瘤医院——始达 I 期临床研究中心” 我国自主研发抗肿瘤新药物将惠及更多患者

本报讯 日前,“复旦肿瘤医院——始达 I 期临床研究中心”在我校附属肿瘤医院成立。

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中心医药生物技术处、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医药处、复旦大学科技处以及肿瘤医院有关领导和专家共同为中心揭牌。肿瘤医院院长郭小毛教授与美国 START 公司执行总裁 Dr. Anthony Tolcher 在成立大会上致辞。

据悉,目前我国虽然在药物临床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距离国际标准仍有很大差距。特别是 I-II 期临床研究的数据很少能够得到国际上药政部门的承认,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开发国际市场的关键因素。国内所进行的临床研究数据因为流程管理、数据采集等方面还不完全符合国际规范,很难成为国内外药物企业研发的理想支持数据,要想真正在国际上推出“中国制造”的药物步履维艰。“复旦肿瘤医院——始达 I 期临床研究中心”的成立,将力争通过两至三年的时间,推动更多

目前,我国癌症患病人数占全球癌症病人总数的 20%。但是,我国却很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新药。“十二五”期间,国家积极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把发展生物和医药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其目的就是推动我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走向国际市场。尽快让我国 I 期或 IIa 期临床研究数据能够支持国内外药企的药物研发进度,已经成为生物医药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自主研发的抗肿瘤新药进入 II-III 期临床,进而上市,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惠及更多癌症患者。

“改变这种情况,一是需要一个具有一期临床药理基地资质和经验的医院实施,二是需要拥有一个具有国际水准、按国际标准进行规范化操作的平台。”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复旦肿瘤医院——始达 I 期临床研究中心”执行总监李进认为,“我国要想尽早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子靶向药物,必须联合国际一流的抗肿瘤新药一期临床中心,通过国际合作,在国内建立一期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中心,为今后工作迈出重要的一步。”

“许多中国肿瘤医生很想在

第一时间就接触到在美国和欧洲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更好治疗肿瘤的方法,并更早参与到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中。”美国 START 公司执行总裁 Dr. Anthony Tolcher 表示,“我们希望能将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带到中国。”

此次在肿瘤医院、美国 START 公司与中国千骥创投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了“复旦肿瘤医院——始达 I 期临床研究中心”的成立,该中心将致力于肿瘤药物的 I 期临床研究,并以成为同时符合中国 SFDA、美国 FDA 和欧洲 EMEA 标准的 I 期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中心为目标。

近十年来,肿瘤医院参与并高质量完成不少大型国内外新药临床研究项目,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研究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早期临床研究体系,符合国家对于新药研发的长期规划要求,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作为美国 START 公司第三家研究中心——始达上海,将以肿瘤医院 I 期临床研究基地为依托,凭借一流的医疗条件和大批量的样本数量,开创性地整合 SMO(临床试验现场管理组织)和 CRO(合同研究组织)的运营模式,按国际化的标准进行数据收集,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流程规范,向大型跨国和国内制药企业以及中小型创新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开展早期临床试验的数据。

据悉,针对目前的发展趋势,肿瘤医院将逐步加大抗肿瘤药物 I 期临床试验的投入与培育,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肿瘤医院将有 10 个左右的试验项目同时开展。而这些项目的开展,将为那些常规治疗失败的晚期和转移性癌症患者带去福音,为患者提供可能的延长生存的机会,掌握治疗的主动权,而不是消极的等待。 **文 / 倪洪珍**

华山承办全国性感染与抗微生物治疗会议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学会和我校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承办中华医学会第三届感染与抗微生物治疗论坛、第九届全国感染性疾病及抗微生物化疗学术会议、第一届上海国际临床微生物及抗微生物化疗学术会议,中外 1000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与会专家围绕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流行现状及防治对策、MRSA 感染诊治策略、如何应对耐药多药细菌感染带来的挑战、侵袭性真菌病诊治策略等研究热点作专题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者通过大会发言、壁报、论文摘要等形式,进行了广泛交流。 **文 / 戴润明**

中山心内科开设高危遗传性心血管病门诊

本报讯 中山医院心内科日前开设高危遗传性心血管病专科门诊,对遗传性心脏病高危人群进行基因检测,在病人尚未发生器质性变化前作出早期诊断,或对临床上难以鉴别的情况进行明确诊断。

据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教授介绍,遗传性心血管疾病是指发病由基因突变引起,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一组心血管疾病。这类疾病与先天性缺陷性疾病不同,患者可正常发育,但在一定年龄后会在心脏结构、电传导和功能等方面出现异常,多数在出现心跳骤停等急症时被发现。

该疾病经过近十几年的研究,发病机制、基因突变位点以及基因突变与表型的关系越来越清楚。 **文 / 卜丽萍**

上医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合作授新课程

本报讯 日前,我校研究生院和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合作,首次开设新型课程《临床医学研究进展讲座》。

该课程在征询有关专家意见和多方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推出,是我校上海医学院对外交流合作项目的一次积极尝试。第一年课程全程由香港中文大学 12 位教授承担,内容涵盖心脏、呼吸、消化、内分泌、肾脏、风湿、传染等内科学相关学科,采用双语教学,每次授课包括授课及互动讨论两部分。

此举不仅有助于开拓临床医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思维,提高其科研能力,掌握国际前沿临床研究进展,更能提升临床医学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 **文 / 尚伊**

妇产科医院挂牌 PAC 优质服务示范医院 女性流产后关爱服务落在实处

本报讯 9 月 26 日是世界避孕日,一个全球性的公益纪念日。我校附属妇产科医院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正式挂牌“PAC 优质服务示范医院”。

PAC (Post-Abortion Care),即流产后关爱,是一种标准化医疗服务,通过一系列服务,向大众尤其是前来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患者宣传避孕知识、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该项目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共同发起,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妇产科医院因率先在国内开展 PAC 专家门诊,并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共同认可的“PAC 优质服务示范医院”称号。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胡金霞主任、上海市妇联翁文磊副主席、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主任委员程利南教授、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总监郭榕和妇产科医院院长郭惊雷、党委书记华克勤等参

◇相关链接

据悉,今年世界避孕日的主题是——爱,不要伤害。我校附属妇产科医院作为全国仅有的两家 PAC 项目示范服务医院之一,该院专家华克勤教授接受了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夜线约见”栏目的专访,就人工流产的危害、多次重复流产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及合

加了揭牌仪式。

与会领导在致辞时强调,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女性健康,PAC 项目从学术走向社会,是一种进步,更是一种推动;该项目的启动将推广流产后关爱优质服务示范门诊,为流产后女性提供咨询服务、促进落实避孕措施、保护流产后女性生殖健康等工作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模式;妇产科医院近二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做好流产后的关爱服务,希望在规范化流程及优质服务过程中将宝贵经验推广给更多的医院,以促进全社会对女性健康的重视。

郭惊雷表示,作为一家有百余年历史的妇产科专科医院,有责任更有义务将“关爱女性,呵护生命”放在首位,发挥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利用逐步改善的诊疗环境,为流产后女性提供关爱和帮助,宣传避孕知识,提供咨询服务,配合政府做好这项利民工程。

成立仪式上,郭惊雷还代表妇产科医院接受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伊爱基金”的首批资助。

并症、避孕方式的选择以及男女双方对于避孕知识的认知等进行了讲述。

专家呼吁:年轻人要学会爱自己、爱他人,知晓正确的避孕知识,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科学避孕,远离人工流产。

文 / 王珏



儿科医院配合建院 60 周年庆祝活动,日前在职工食堂开辟了文化阵地——儿科医院文化墙,其旨在发掘职工中的各类人才,培育人文素养,搭建展示儿科人爱岗敬业、积极进取精神风貌的平台。图为大家在欣赏首期文化墙展出的职工摄影作品。 **文、摄 / 张志豪**

我校专家指导老年痴呆症防治

本报讯 9 月 21 日是“世界老年痴呆日”,上海市医学会、《家庭用药》杂志、复旦复华药业共同举办以“传播脑科学,促进脑健康”为主题的大型公众健康教育,由我校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沪上十五家医院医疗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在五个现场,与 6000 多名市民面对面进行有关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权威性、实用性指导。

我校副校长兼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出席活动并讲话。桂永浩表示,医科是我校的优势学科,普及现代健康观念和医学保健常识,提高公众健康素质,是高校为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之

一。我校附属医院拥有一大批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开展医学科普教育有着丰富的资源,不少医院还在多年实践中打造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教育品牌。

据了解,由于公众认知非常有限,我国 100 名老年痴呆症患者中仅一人会主动找医生看病,而目前我国老年痴呆患者人数高达 600 万,约占世界总病例数的 1/4,且每年平均增加 30 万新发病例,如何加强老年痴呆疾病的认知度和就诊率,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我国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文 / 孙国根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功勋

■ 姜义华

我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是三句话：第一辛亥革命是一座里程碑，第二辛亥革命开始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第三辛亥革命使中国走上一条非常艰辛的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一条自主道路。

辛亥革命是一座里程碑

辛亥革命是一座里程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第一它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我们从以君主为核心的以王朝为主要载体的传统国家进入了真正的近代性国家，或者现代性的国家。

第二在整个中国多民族统一过程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发展中是一个里程碑。中华民族实际上很早形成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就是汉族本身也是融合了众多民族形成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始终是由不同民族相互混合构成的，当然多数是汉族为主体，但是也有像元朝（主要是蒙古族）、清朝（主要是满族）成为统治的民族。辛亥革命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中最特殊的地位就是它以排满、反满所谓驱除鞑虏为最终的动员群众的旗帜，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发现中国不能重复西方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违背了长时间以来的中国历史传统，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当时面临列强纷纷向中国的边疆地区渗透，激怒挑拨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边疆民族地区从中国分离出

去的严峻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个到今天我们讲的非常响的概念：中华民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开头，到武昌起义后宣布五族共和，就是各民族应该有一个平等的关系，放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下来共同缔造我们的共和国。

第三是中华文明全球性的转型里程碑。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发展到以现代工业为核心，传统的以乡村为基地的发展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文明。

辛亥革命开始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涵盖各类许多不同民族的大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概念形成标志着整个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也有特别强的列强蚕食瓜分中国的严峻挑战的现实，所以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就把国内各民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这之后，谁要想分裂中国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把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从整个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必然要遭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迎头痛击。

中华文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世界上

或者历史上曾经非常活跃的二三十个历史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在绝大多数时间中走在世界前列。虽然有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是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再生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又会重新继续崛起，得到新的复兴。

辛亥革命使中华民族、中国、中华文明的发展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全新的发展方向。君主统治被推翻了，共和国取代了传统的王朝政治，在这之后，谁要想在中国恢复王朝政治，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袁世凯是这样，溥仪也是这样。通常讲中国历史是循环的，以三百年为五百年一个周期，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中国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民族共和国，中华民族变成一个新兴的巨型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这个历史趋向已经不可逆转。

辛亥革命使中国走上自主发展道路

辛亥革命代表着中国人开始探索一条自己要走的道路。辛亥革命受到西方强烈的影响，也受到东方的、日本的相当大影响，但是中国怎么发展，中华民族怎么发展，中华文明怎么发展，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一代一代的志士仁人都在努力地思考，努力地实践。我们这样一个巨型的国家，这样的巨型民族，这样巨型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根深蒂固的积淀，实践证明了按任何一

个其它文明的模式去做都是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后我们想搞议会制，搞三权分立，搞多党制，尤其是两党制，都曾经在中国实践过。但是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实际上这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我讲过毛泽东是一个最希望实现民主的人，他一直都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阶级。他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巴黎公社制的国家。当官的都要群众选举，他们要最低的工资，不能高过一般工人的工资。所以1966年大字报广播的时候，他称之为不进公社的巡演。当时他希望搞大民主，让人民真正作主，但最后发现这样就是无政府状态式无限制的泛滥，整个国家陷入了全面内战。

中国一直是大一统国家，有自己的管理逻辑。怎样实现现代民主，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举一个例子，台湾才2300万人，一个选举把整个社会全部管起来，要多大的成本。我们13亿要这样选起来，那个成本吓死人，最后选出来的跟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关系，很值得怀疑。至于我们这个民主，中华民族民族关系怎么处理，中华文明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有差不多七千年甚至八千年的历史，在世界上有独特的地位。辛亥革命时有个外国人写了一个四千年的农夫，现在中文版翻译出

来，就讲到了中国的农业了不起，几千年来保持了那么好的生态，土地、土壤保持了那么丰厚的肥料，用那么多土地养活了那么庞大的人口。中国的农耕文明今天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但面临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是非常绿色的、生态的、可以自我平衡的农耕文明，现在被石油农业所取代，土壤肥力急剧下降，现在靠化肥、农药、机器耕种，靠各种各样的机械化，能不能持续发展，再有两千年、三千年，仍然保持那么强大的再生能力？传统的农耕文明容纳了最广大的劳动力，但现在农村主要劳动力都进入了城市，农耕文明最精粹的劳动力投入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何况大规模工业化，交通现代化以及城市化侵扰了我们的农村、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农耕文明怎么样焕发出它的新力量？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运作的许多核心理念，和传统文明的理念怎样互相协调？比方现在更多地讲究个人的自主、个人本位，如何与传统的中华文明以国家、以社会、以天下作为自己核心价值统一起来？，我觉得像这些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功绩并不是因为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是它开始引导我们去探索，中国究竟怎样从古代走向现代，中华文明怎么样从古代走向现代，中华民族怎么样从古代走向现代。（本版文章根据速记稿摘录未经本人审阅）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经济的延续和变化

■ 朱荫贵

先提两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是1911年爆发，在革命爆发之前晚清政府已经开始了新政，好像搞得也还不错，为什么辛亥革命爆发后它就顷刻间土崩瓦解，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么快的一个变化？第二是这样一个两百多年的皇朝，在起义发生时各省份纷纷地出现了独立，举起了大旗都要反抗清朝的统治，形成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使得晚清政府在政治上顷刻间土崩瓦解。这种突然的政治变化跟经济是什么关系？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它不会是很突然的，本质上的发生变化这是很难的。

晚清政府顷刻土崩瓦解跟经济有密切关系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了近代，列强开始对中国的土地对中国的社会进行了不断的入侵，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下逐渐地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反应当然不甘受辱，不甘变成国破家亡的奴隶状态，所以奋起反抗。最主要的外在体现，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这是第一波，它由清朝政府从上到下推动。日本明治维新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段上。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洋务运动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就是签订马关条约之前，大概三十年多一点。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近代工业，大机器工业主要是军工企业。另外一块民用企业主要是官督商办性质，民间资本掌控的企业数量非常少。政府对这些民间资本的企业基本上没有扶持、鼓励的政策。所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

败了，然后痛定思痛开始放开民间兴办新式企业的禁令，然后从戊戌变法从上层的制度开始进行一些变化，但是仅仅是百日维新，很快很多东西撤销了，接着就到了清末新政时期，不仅放开了民间兴办，而且是鼓励大家兴办，比如当时投资五千万两银子就可以得到第一等的贵族称号等等，给了很多鼓励政策。铁路大发展，企业大发展，各行各业好像都在有大变化，好像是走欣欣向荣，但是突然之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洋务运动时期开放的大小、太差，社会的发展远远没有从制度层面、从

国体层面进行改革，仅仅是机船路矿吸收了一些器物方面的东西。到了清末新政时，在各个社会阶层的压力下答应搞立宪，做一些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但是后来一拖再拖，不仅没有做，到最后连经济和实业都开始往回收，1909年后的铁路收归国有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所以在这个时期，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变化中兴起的很多民间的实业家、企业阶层对晚清政府的信心丧失，清朝政府继续统治下去的合法性在大家眼里逐渐消磨殆尽。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辛亥革命枪声一响清朝政府垮台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跟清朝政府的新政很有关系。清政在1900年后对各省发了圣旨，就是各省、各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都要设立商会。这个商会是政府下令设立，所以省里面设立，市里面设立，县里面也设立，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层次的工商管理系统。这些人多半是当地的乡绅或者是有功名的人，都是有一定的见识，有一定文化的。这些人是中国社会里前所未有的，形成了另外一种社会中有组织的力量，而且是合法的。晚清新政开始往回收时，实际上直接涉及到这些人的利益。当晚清政府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挑战时，这些人又成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力量。比如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整个的指挥者和后面的组织者就是商会的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跟各省的督抚结合在一起，支持他们独立或者是撑掇他们独立也是商会的这些人，他们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资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民间的不满。老百姓的痛苦积攒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人带头组织，那么这个社会可能还延续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到了这时社会发生了变化。很重要的一条是晚清新政于1905年停止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停止以后怎么安排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的，甚至不止十年寒窗的世人？不知道。没有给出后续的或者是其它替代方法，所以这些人形成了推翻清朝政府的重要的一种力量，这些人很多是进入商会，然后联合起来。这也是清朝政府顷刻之间分崩离析的原因。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延续和变迁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怎么评价辛亥革命。

从经济角度说，晚清之前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晚清新政，这个期间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法律法规、税收等等一系列的体系。零零碎碎有一点，很少，没有形成体系。中华民国成立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阀，都推动经济发展，干预很少，因为军阀要割据就必须有实力，要有经济实力，所以各地军阀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经济。袁世凯政府成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一整套的工商财政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他聘请张謇做农工商总长，在1913-1915年两年任期之内张謇做的一件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模仿外国的或者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是经济方面的，有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制度的，有怎么发展企业的，甚至有证券交易所法、破产法税收等等。两年内制定了二十多项，加上细则和实施的一些具体解读，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的制度。在鼓励民间继续兴办企业，继续兴办推动经济发展的潮流里，从这时开始有了制度的约束和规范。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然后是白银时代。

在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举几个事例：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有面粉大王、面粉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都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个时候大大小小的企业集团（一个集团里面可能有几十家企业，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和行业中）有几十个，分别承担起了中国工业化的各个领域里面的支柱性作用。所谓面粉大王和面粉大王就是荣家企业，是新政时起步到三十年代，他们的面粉厂从一个变成十二家，纺纱厂发展到九家。面粉第一个厂曾经是21.6万银元，到了1932年的时候就到了1800多万。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制造业兴起这一块。

另一块是金融行业。中国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工商银行，到1911年只有几家。但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年，

新成立的银行就有14家，1922年达到150多家。在这期间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信托公司一系列的金融机构纷纷建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从国家银行到地方银行、民间银行、华侨银行等等不同层次的金融体系。第三个块是交通运输业，清末有几千公里铁路，三十年代达到两万多公里，铁路是这样，轮船同样如此，全国的大江大河到内河内港遍布中国的轮船公司。公路在这个时期也修了几十万公里。

我们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开始打下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个市场经济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政策法规、税收等等构成上层的建筑，然后制造业加上金融结算体系和流通体系，这些使得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过去的以农为主的经济开始转向大机器生产的产业，它发展成基本的市场经济框架的格局，这个节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辛亥革命带来的。所以今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

这是延续和变迁的，延续因为它是渐变，所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农村变化不大，但是农村经济在这个期间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例如新式农场的出现，机器作物的种植加工，代表性最强的就是机器卷烟业，而且是华资的，在1912-1920年年均增长是34%，非常快。

当然内部的一些经商传统，比如说分配习惯，商业的无形制度等等，这些是延续的。延续的还有经济往上走的速度，继续在发展。变迁就是开始出现市场经济的大的格局，其中金融系统、交通运输系统还有制造业的系统开始发展。从今天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仅仅是打下了一个粗粗的毛坯，一个基础，市场经济的一个初步轮廓。因为这时中国毕竟还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中国上还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它们的实力还很强大，当然不能指望辛亥革命一场革命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只能说它是一个节点，它带来了使中国土地上很多东西的变化有了可能，而且开始在实现之中。

从辛亥到五四这十年间学生民族国家观念的提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12年~1917年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北大校长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制定了当时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核心就是军国民教育为宗旨。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1917年蔡元培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北大为中心，北大学生为主体成为一个民族主义思想的新发源地和扩散地。南方的复旦大学也积极支持学生的民族爱国运动，与北大相呼应。

第二个阶段是1917~1918年，虽然只有一年，但是很重要。1917年时，新文化运动开始。这一年，段祺瑞政府要与日本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以青年学生为代表反对，由于没有得到各界力量的支持，这次运动很快夭折了，但学生已经找到了动员的有效方式和手段。

到了第三阶段1919年，巴黎和会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从辛亥到五四，学生群体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青年学子在这个时候成长起来。五四之后，李大钊、陈独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也就是在这个定义上，没有1910年代的学生界国家观念的提升也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

一九一〇年代的中国及其学生界国家观念的提升

■ 马建标

第六届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之一

夯实基础 操练思维 感受实际

秋风送爽,金桂飘香,原野挂果。日前,第六届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揭晓。国际关系与事务学院的浦兴祖教授第三次收获了这一荣誉。

夯实基础 操练思维 感受实际

在浦教授的眼中,复旦学生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应该具有明显的思维能力。所以,他经常思考怎样在培育思维能力方面给学生以更多的收获。在不断总结自己教学生涯的基础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浦兴祖教授提出了他的本科教学12字理念——“夯实基础,操练思维,感受实际”。

浦教授反复强调“操练思维”的重要性。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他着力培养学生“不唯书、不唯师”的独立思考意识,坚持启发式教学,在课内经常开展简短的“小讨论”,每学期组织几次课堂“大讨论”。且申明“重在讨论、辩论,不在结论、定论”,“老师的发言也只是一家之言,不希望代替与封闭同学们的思维。”每次期末考试卷上,浦教授都会出一道题:“就本课程的教材或任课老师所持的某一观点,阐述自己的不同见解。”他说,为的是让学生逐步树立校歌中所强调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为了和学生有更多的互动,浦教授推出课后“聊学”制度。每周上课结束后,他都会和自愿留下的学生“聊”天般地谈“学”、答疑,或联系实际展开讨论。这样的讨论常常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在多次发烧、体质虚弱的情况下还坚持和学生聊学。

谈到“感受实际”,针对本科生缺乏了解社会实际的现状,浦教授要求学生随时关注我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如撰写发言提



浦兴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任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等。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和西方政治学说史。

纲“我看今年‘两会’”;听取实际部门领导来校介绍政治制度的运行情况;“走进人大”,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参与模拟常委会会议等。而最为重要的是,从九二国政开始,他坚持要求每位学生利用假期回乡,开展一次社会调查,了解某项政治制度在基层的实际运行状况,写出有实例有思考的调查报告。

浦教授同时也强调了“夯实基础”的重要性。他认为,不重视基础,只操练思维,很可能成为“小聪明”;只重视基础,不操练思维,则很可能成为“书呆子”。

同学们认同浦教授的12字教学理念,但也有人曾担心教、考脱节,怕仍由一张试卷定成绩。为此,浦教授逐渐探索出了“复合式”考核机制,即期末书面考试占40%,平时讨论发言、读书笔记等占20%,假期调查报告占40%。近年来,还将学生的优秀调查报告刊于课程网站,以示表彰并供交流。

在应邀给毕业生赠言时,他将这十二个字演化为:依托基础,投身实践,善于思维,回报社会。

学校支持 院系指导 自身探索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这门课程,是1984年由浦教授率先于全国在复旦开设的,现在已形成了一个老中青合作的课程团队。二十七年来,在浦教授和其他老师

的不断探索下,这门课程已被评为校级、市级和国家级的精品课程。2007年4月,浦教授带领团队创建了本课程独立网站。四年多来,网站总访问量已达60多万,平均每月1.15万,最多的一天达5431人次。

浦教授还是出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教材与著作的第一人。在另外几位老师的参与下,他于1990年初推出国内第一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一些政治学者撰文指出,此书“可谓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大百科”,“这一零的突破捷足先登地为政治学界着力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树立了典范”。此书在境外也获得好评。日本庆应大学一教授说,“日本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恐怕无人不曾读过这部书”。香港三联书店约请浦教授等专为境外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1995年出版后不久,即被当时港英政府列为公务员培训用书。1999年,浦教授又在上海出版了他主编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前者被列为全国百部庆祝国庆50周年献礼书之一,后者作为教材已在复旦出版社印刷32次,总销量达到二十九万七千册,并被韩国翻译出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两个版本均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学校规定,学期一结束即须

将各课成绩输入全校统一的管理系统。而浦教授的课程因为涉及到假期调研报告,需待下个学期初才能“三元合成”课程成绩。经学校分管副校长和教务处商议,决定破例特批该课程每次于下学期初完成登分工作。浦教授说,“我们的课程建设,真是离不开校院及各方的支持。”

敬业负责 亲近学生 教研相长

浦教授切实构建教学梯队与教学团队,经常与中青年教师探讨教学改革计划,交流教学经验,全力支持青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每一项探索。他为该课程教学团队的青年教师“走出去、请进来”牵线搭桥,为青年教师主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班级作辅导讲座,为学生解惑释疑,推动青年教师开展研讨性、实践型课程建设。

浦教授给青年教师三点建议: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要有责任心和敬业精神,要经常思考: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如何培养学生;要亲近学生。良好的教学效果需建立在了解教学对象的基础上。要舍得花时间和学生交流,这不仅仅对学生有启迪作用,对于教师自己往往也会有“教学相长”的收获;要重视科研和教学,两者在时间与精力上似乎相互排斥,但在实际效果上是互相促进的,形成“教研相长”的良性互动。浦教授举例说,多年前他开始研究反腐败问题,后来常把研究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并和同学展开讨论。这促使他不断深化研究,并于前年完成《试论阻断私欲与公权的勾连》一文,发表在该专业的权威期刊《政治学研究》上。

“爱我者学生,我爱者学生”——这是浦兴祖教授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他对所有学生数十年如一日的承诺。 记者/李倩

◇ 新书介绍



《历史的真相》

作者:(美)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遭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受到质疑。该书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根基,并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



《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

作者:(德)普珀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把方法论中的所有方向(诸如古典方法论、现代方法论)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从较高的层次上拉下来,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例子当中展示。这样不仅只是批判性地反映这些方法,也是训练法律初学者将这些方法运用到个案中的能力。



《故事照亮未来: 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

作者:杨照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从千头万绪的故事和现实中提取出一百个关键概念,如协商、和解、法律、制度、身份、记忆、媒体……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的本来面貌有着提纲挈领的引导作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开放时代,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利益和经验,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努力的方向,或者没有任何准备,将无法适应我们理想中的那个未来,而书中的这些故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努力或避免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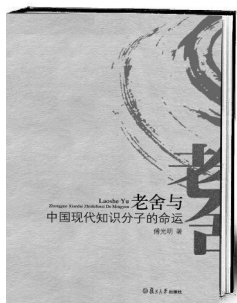
《当花侧帽说纳兰》

作者:陈赋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纳兰容若的一生,都为身世所累。该书将纳兰词与纳兰生平穿插结合,理性地去解析几百年前一位凤毛麟角的才子。

历史深处的老舍

■ 傅光明



《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者:傅光明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近年来,研究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现代作家,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显露出来,即随着新史

料的发掘,会发现,以往对作家和文学史的书写,已成定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受到挑战与颠覆。事实上,我们在对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史书写的时候,对把他同时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书写,显得并不充分。

在文学史中,被冠以“人民艺术家”荣誉的老舍,与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家老舍,两者之间似乎不仅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甚至两个身份是截然对立的。然而,放在历史的视角之下进行审视,会发现两者其实是在同一个老舍身上得到了和谐统一。这尤其意味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个在许多人眼里常常意识形态化了的“人民艺术家”,并

非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作家。换言之,长期以来,倒是“人民艺术家”把作为自由作家的老舍遮蔽了。

我们常常只关注在文学史里给作家一个“文学”的定位,而忽略了躲藏在文学深处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关于这个“历史”所需要的相关资料,相对艺术文本来说十分匮乏,甚至根本就消失在了历史的真空中,连踪迹都难以寻找、捕捉。尽管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自叙传的性质,但它并非自传。即便自传,也非绝对可信。因此,无论是研究者写作家论,还是从作品人物、结构、主题、思想、艺术等层面进行剖析,时常

与那个“历史”分割开来,也是自然的。

如果能够事后诸葛亮地看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不仅老舍,许许多多作家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段,写了大量令后人觉得该替他们脸红的文字。但在当“文学身体”只能仅仅充当“身体政治”的附庸时,“自由性”也只能让位于“人民性”。

不难发现,至少在文学创作上,他还是尽力坚持将意识形态文学化,并努力体现出作为“人民艺术家”的使命、责任。但只要给了他“自由”的环境和“自由”的机会,他会不失时机地在言、行和作品中,播撒思想“自由”的种子。 (文字节录 何成)

往事如烟

留法“双博士” 药界“老夫子”
——缅怀宋梧生先生

今年是中国现代医药业开拓者之一宋梧生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宋梧生先生生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药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顾问、九三学社民主人士。他创办了中法大学药科(现复旦大学药学院)和国内首家癌症放射治疗机构中比镭铀治疗院(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设了我国首家生产注射用葡萄糖药厂大中化工厂(现上海葡萄糖厂);并在其家乡开办了浙江著名综合性医院阳明医院(现余姚市第一人民医院)。

1895年,宋梧生出生在浙江余姚乡间,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接到上海抚养,就读于外国教会所办免费公学。十几岁只身赴欧洲求学,就读于比利时高级中学。不久一战爆发,学校停闭,和国内的联系亦告中断。当时身无分文的他幸得几位比利时老人援助才度过难关,这次经历使他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帮助是多么重要,这也是他日后如此热心公益的重要原因。

战后,宋梧生考入法国里昂大学医科,同时攻读医学和化学专业。他发愤苦读,成绩优异,深得法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Grignard 教授赏识,有幸在其指导下开展呋醇类化合物新合成方法的研究。1923年,他获法兰西共和国理科国家博士学位,同年发表论文《肺炎并发肺结核病的新治疗方法》,获法国里昂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健康提示

警惕淋巴瘤

淋巴瘤是一种起源于淋巴结或其他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近年来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多见于中青年,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沿海患者多于内陆患者,城市患者多于农村患者。

淋巴瘤的确切病因至今尚不明确,但生活节奏快对该病高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容易激活淋巴细胞,经常熬夜又不利于免疫系统有效恢复。一旦人体自身免疫力减弱,平时就更容易感冒,受病毒感染的机会会大大增加,就更容易惹病上身。

值得注意的是,恶性淋巴瘤被认为是最会“伪装”的疾病。淋巴瘤早期症状与感冒等“小毛病”非常类似,一些早期信号尤其要引起重视,最明显的症状是颈部、腋窝或腹股沟出现无痛肿胀的淋巴结。因此,一旦发现淋巴结肿大,要立即到医院检查。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上半身淋巴结无痛肿大;浑身发冷,体温不正常,尤其是夜间高烧;体重下降,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咳嗽,呼吸困难,皮肤发痒,扁桃体肿大,头疼等症状,就要警惕是否患上了淋巴瘤。

凌晨12点到3点是人体免疫功能恢复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师生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经常熬夜是预防淋巴瘤的最好方法之一。
文/吴为
(本栏目与校医院合办)

一人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同时获得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上世纪20年代中叶,宋梧生谢绝国外学界的挽留,回到祖国。在上海,他和他人共同筹建圣心医院(今杨浦区中心医院),开始行医生涯。当时上海杨树浦劳工密集地区天花猖獗,他和医院同仁不顾危险,积极救治,为扑灭天花流行做出了贡献。

有感于当时国内高级制药人才的大量缺乏,宋梧生向蔡元培先生提议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上海设立中法大学药科。在他的积极奔走下,1929年中法大学药科终于在上海成立,他先后担任教务长、系主任,并亲自讲授药物化学课程。该校培养的300多名毕业生成为高校主要师资和资深药师骨干。解放后,该校与国立上海医学院药科合并,成为现今复旦大学药学院前身。

宋梧生在其行医生涯中深感不安的有两件事,一是国内没有专业癌症放射治疗机构;二是国内药品品种数极少,尤其是原料药几乎全赖进口,国内连生产注射用葡萄糖等最基本药物的厂家都没有。为此,他多方奔走,

利用比利时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31年成立国内首家癌症放射治疗专科医院——中比镭铀治疗院,并先后担任常务理事、事务院长、副院长和院长,为我国癌症治疗史掀开新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国内药品供应日趋紧张,进口的注射用葡萄糖更是告罄。宋梧生变卖家产进行研发,终于研制成功质量等同于进口货又价格低廉的注射用葡萄糖。1942年,我国第一家生产注射用葡萄糖原药药厂大中化学工业厂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制药史上的空白。

宋梧生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时常想到自己应该为家乡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当时整个余姚地区仅有一座设备极差的小医院,连最基本的外科小手术都无法完成。是他争取到一批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免费医疗设备,,并向同乡募集资金、土地,于1946年创办了拥有百张床位的综合性医院阳明医院,成为浙江最著名的医院之一。

宋梧生一生热爱科研工作,先后辞去肿瘤医院和药厂的领导工作,安

心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学系致力于科研,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身患多种疾病,依然孜孜不倦地指导研究生开展心血管药物研究,还与他人共同开设了新课“化学药理学”。他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等多门外语,方便了他随时关注国际医药学领域的最新动态,业余时间只要有空他就跑图书馆,家里也到处都是外文专业书刊。

宋梧生为人谦逊、一身正气,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热心公益、桃李遍地,被药业界尊称为“老夫子”。他敢于与侵略者、反动派斗争,多次严拒敌伪“聘任”,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还曾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安全转移。解放后,他坚决服从和执行党的政策,冷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积极参与宗教界爱国运动,并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呼吁全体宗教界人士不要受蒙骗”一文,影响深远。

宋梧生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若能看到自己当年辛勤栽培的树苗如今已在后人的精心呵护下枝繁叶茂,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文 / 宋涛能

诗情画意

傲立世界科技林
(调寄“天仙子”)

六二国寿普天庆,天宫一号太空升。浩浩苍穹曜五星,大红灯,相辉映,神州歌舞齐欢腾。

天宫一号太空行,拓开宇宙新航程。只期神八对接成,中国人,志凌云,傲立世界科技林!

作 / 周永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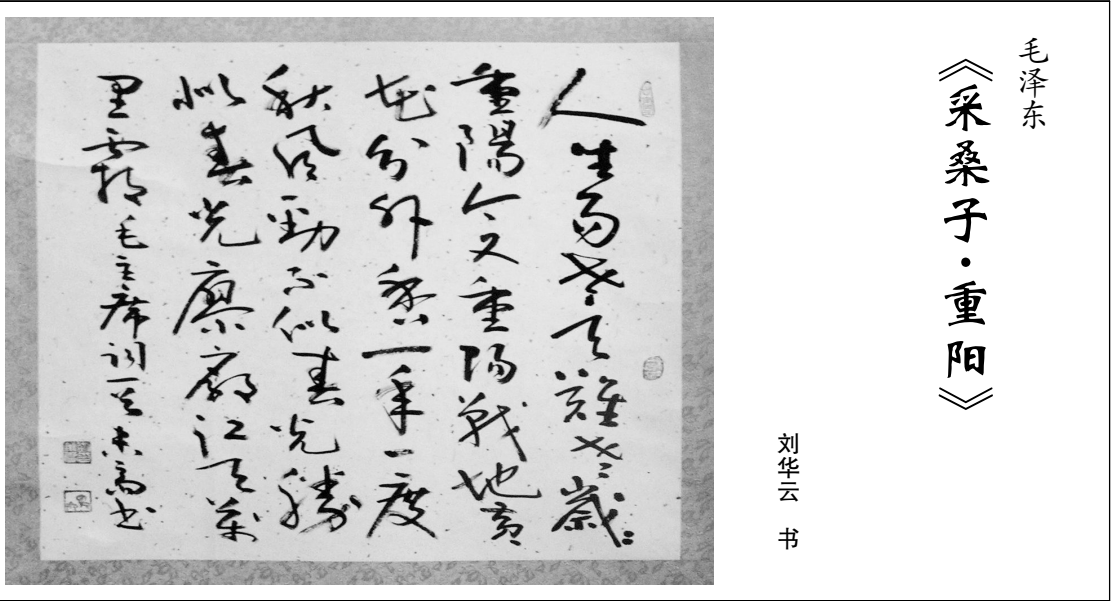
追寻红色足迹

访沂蒙老区

要去沂蒙地区了,心里想的是平房黑瓦,基调灰蒙蒙的。真到了临沂,仿佛给脑海中的黑白照片一点点了色:绿的树,红的花,蓝的河,多彩的房子……在城市规划馆,我们看到了“大美临沂”的蓝图,不禁感叹:这是老区吗?是的,我们还停留在黑白印象中,以为老区都是贫穷落后的。过去的革命年代,老区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如今的发展时期,老区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建设家园。

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我看到镶嵌着194700颗子弹壳的红墙,触摸着那凹凸不平的墙面,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沂蒙六姐妹”最大的不过20出头,却冒着生命危险,不分昼夜地护理伤员。更有30多名妇女,在刺骨的激流中用木板搭成“人桥”,使一个团的兵力得以通过……

在粟裕将军墓前,我们了解到这里长眠着一位“最小的烈士”——女烈士陈若可刚出世的女儿。她刚一出世就被敌人放在马料袋里颠簸了百里多路,几天后就和妈妈一起被杀害了……陈若可在就义前把自己的鲜血滴进女儿的嘴里:“你没喝过妈妈的奶水,就喝一口妈妈的血吧。”英雄的母女,我们铭记!没有革命先辈的抛头颅、洒热血,哪有我们今天的安居乐业?在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前,先问问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文 / 张翠



有感而发

我1986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掐指算算,将近25年了。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撰写的消息不少,发表的似乎也可以,还真有点心得体会与大家共享。

如今,我们有些记者采写新闻时不一定去现场或“蜻蜓点水”地到到场,仅凭“东家”Email发来的素材加上一些电话“沟通”,就开始“烹饪”加工。奇了怪了,照样能把新闻写得“有声有色”,有时候居然也发表了。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对读者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我在采写“恐惧记忆形成机制研究有新发现”这一消息时,项目完成方我校脑科学研究院马兰研究组曾给了我一份文字素材。素材是从专家学者角度提供的,讲了很多“重要意义”等,用了许多专业术语、符号以及用专业术语和符号组成的研究过程,我这个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从事新闻写作以

我是怎样写科技新闻的

来,我一直认为我看不懂的东西,也代表着一大批读者看不懂,而自己看不懂的东西是肯定写不好的。

于是,我提出要去现场看看实验过程。也许是准备过程比较麻烦,起初遭到了拒绝,但经不住我再三坚持,最后采访对象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那天,我按约来到实验室,在马兰教授的指挥下,几个研究生为我演示了两个对照组的老鼠“恐惧记忆形成”的全过程。因为是亲眼所见,所以写出的东西有现场感:“马兰教授指导李玉婷、李浩洪、刘星等研究生对老鼠进行了恐惧记忆的研究。他们在播放一段声音的同时对小鼠进行电击。之后,给老鼠再次播放同样的声音但不再施加电击,观察老鼠是否对这段声音产生恐惧记忆。……”

长期以来,我非常了解有些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很有性格,他们非常不放心记者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他们的

科研成果,而更喜欢用他们“科学而严谨”的语言来描述,因为他们担心会“走样”,引起内行的误会,甚至非议。因此,写文章时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既让读者看得明白,又让专家放心。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完成的稿子给专家审阅就可以了。

写科技新闻的记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一般性地写写似乎没问题,但要写得生动却很难,让读者叫好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在写稿时会不知不觉地用一些“很学术化”的语言。我在采写“恐惧记忆形成机制研究有新发现”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的导语是这样写的:“经近3年研究,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马兰研究组发现,脑内的一种蛋白质参与了‘恐惧记忆’的形成。研究表明,一种名叫β抑制因子的神经信号分子,在脑内是一个参与恐惧记忆的‘恐怖分子’。”在采写《“第一晚效应”失眠症治

疗找到方向》时,我是这样写的:“为模拟人在新环境下(如出差住宿等)出现换床后失眠现象,即“第一晚效应”,研究人员更换动物居住环境,考察小鼠在新环境中的睡眠行为。结果显示,多巴胺D2受体正常的小鼠面对新环境刺激极为不习惯,入睡困难;而剔除了多巴胺D2受体的小鼠则‘高枕无忧’,迅速入睡。”

《一项研究成果有望找到神经胶质瘤治疗新方法》的最后一段,我是这样写的:“如果说IDH1基因突变是为肿瘤细胞生长踩了一脚大力‘油门’的话,那么上述研究就是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找到了宝贵的‘刹车’。”

以上“恐怖分子”、“高枕无忧”、“踩刹车”等语言,我认为运用得还是比较生动、成功的。

总之,写科技新闻时能不用最好不用专业术语。这样,读者看得懂,感觉也会好些。
文 / 孙国根